

城市历史空间再利用与城市文化空间生产

——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¹

王淑娇，李建盛

【摘要】：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种历史的相互生产和创造的关系，城市生产文化，而文化又再生产城市，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空间的利用和再生产实际上就是城市空间的再利用和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成都宽窄巷子是这种再利用和再生产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它以一种战略性的眼光、整体性的把握和综合性的视野重新生产了成都乃至中国城市中引人注目的“金名片”，其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成功经验在当今中国的城市改造利用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宽窄巷子；城市空间；历史文化；文化空间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1-0093-6

城市和文化都是历史地发展和建构的，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建构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空间，而不同的城市空间在其历史过程中塑造和积淀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相互生产和创造的关系，正如马尔科姆·迈尔斯在《城市与文化》一书中所论述的，城市生产文化，而文化又再生产城市，这是一种历史的共生关系。^[1]如果说城市生产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视野，那么文化再生产城市体现的则是一种重塑文化城市的策略。这一策略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复兴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巴塞罗那，而且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策略也为许多中国城市所运用，以便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重塑具有自身传统特色的文化空间，比如西安回民街、重庆磁器口、武汉户部巷、长沙太平街、成都宽窄巷子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成功的例子。可以说，在众多的案例中，成都对宽窄巷子传统空间的开发利用和重新塑造具有一种典范意义。它不仅是城市空间利用和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成功案例，而且已经成为成都城市乃至中国城市的一张金名片。本文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分析其特殊城市空间的历史生成和文化生产，论述宽窄巷子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文化特征，并阐述这一举措在今日中国城市文化空间重塑中所具有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城市生产文化空间——宽窄巷子特殊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

今天所谓的宽窄巷子是历史性的，宽窄巷子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间也是历史性的。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过程中，宽窄巷子生产了独特的城市空间，而这种城市空间又生产了宽窄巷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对于宽窄巷子来说，无论作为城市空间还是文化空间，抑或是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和建构的。“城市首先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存在。”^[2]宽窄巷子的空间和文化正是从最早的“少城”到满清时期的“满城”再到民国时期的“新城”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演变、不断积淀和不断融合而形成的，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文化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成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生产、生成和建构为一个特殊的城市文化空间。

宽窄巷子是历经几千年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城市文化空间。早在公元前 311 年，秦惠文王就在现在的宽窄巷子一带建立了一个时称“少城”的小城。这不仅是宽窄巷子最原始的踪迹，而且可以说是成都有确切筑城历史的开端，换言之，少城是

¹**【作者简介】**：王淑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李建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101。

成都最早的城市原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少城的历史就是成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秦惠文王到南宋末年这一千多年的少城发展及其文化生活，历史上少有记载，但人们知道的是，在此后近八百年的历史中，由于南宋末年和明末清初的战火，少城几度毁灭。然而，公元1718年，几近毁灭的少城迎来了一个历史重建和发展的机遇。康熙平定准葛尔叛乱后，在少城遗址的基础上修建了42条胡同，留守成都的八旗兵丁驻扎和生活在这里，原来的“少城”空间在变大，人口在变多，生活在变丰富，文化在积淀，“少城”被更名为“满城”，原来主要是成都当地人生活的具有南方川西特色的城市空间，此时转变成为了主要是满族八旗人生活的具有北方风格的城市空间。与原来的闲适、安逸、无拘无束的少城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不同，满城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区域空间，里面居住的全是满蒙八旗及其亲属，普通百姓则禁止自由出入。那时，这些胡同还不叫宽窄巷子，而被称为“兴仁胡同”和“太平胡同”，它们具有典型北方地域色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生活方式并体现特殊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八旗子弟在满城内分到一定数目的房产与田地，因此，他们获得了游手好闲与追求享乐的物质保障。众所周知，八旗子弟一直以“纨绔”为名，喝茶、游玩、逗鸟、看戏、斗蟋蟀等等成为他们特有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方式。这个区域成为了一个“安乐窝”和“桃花源”，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个专供八旗子弟玩耍的场所。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调尽管表面看来似乎是特属于满蒙八旗子弟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并不与“少城”原有的那种川西地域的闲适安逸和潇洒无拘的生活方式有多大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性。

城市的空间和文化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迁，满城亦复如此。1912年初辛亥革命成功，终结了296年的满清历史，曾经等级森严，繁华热闹，舒适悠闲的满城也逃脱不了它被“革命”的命运。“革命”的后果导致了满城城市空间的“革命”，城墙被逐渐拆除，一些新的建筑如公馆、洋楼与民宅在这里开始涌现，打破了原有的满城城市空间格局，原来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城墙周长四里多、42条胡同错落有致的具有完整形态的满城，在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的城市空间重构中被挤压成碎片，原有的具有浓郁北方特色的“胡同城”逐渐演变成一个“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由此，原有的城市空间几乎被另一种形态的城市空间所取代，此时42条胡同只剩下三条，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宽窄巷子。而宽窄巷子的来历据说是因为一位测量人员随口把宽一点的巷子叫做“宽巷子”，把窄一点的巷子叫做“窄巷子”，把有一口当年清军饮马的井水的巷子叫做“井巷子”。不同的时代生产不同的城市空间，不同的城市空间生产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里发挥着历史性的辩证作用。民国时期的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取代八旗后裔而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享用西餐、咖啡、留声机等现代西式生活方式取代了那种喝茶、游玩、逗鸟的传统贵族生活方式。到民国时期，原来的满城城市空间几乎湮灭，三条胡同与42条胡同相比看似微不足道，但仅有的这三条叫做“宽窄巷子”的胡同却成为了这个被颠覆了的城市空间中特有的建筑及文化遗存，并嵌入到民国城市新空间之中。由此，宽窄巷子历经少城、满城到民国而演变成了混合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川西民居、满清兵营、北方胡同、四合院、民国洋楼等等的杂揉空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空间在变化，生活方式在变迁，文化形式在变化，但从少城、满城到民国却积淀了某种有着内在关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韵味，“少城”原有的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闲适安逸的生活方式、满城那种“安乐窝”和“桃花源”式的生活情趣、西餐、咖啡、留声机等“现代”文化娱乐休闲在某程度上都体现了逍遥自在、知足常乐、闲适洒脱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而“慢”与“闲”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则是宽窄巷子文化性格的基调和精髓。

二、文化再生产城市空间——宽窄巷子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

由于种种原因，宽窄巷子作为历史地形成和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在民国之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原有的空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被其他的空间和用途所挤压，原有的文化形态被打碎，原有的文化空间功能丧失了，宽窄巷子在几十年的流变中成为了“衣衫破烂”的“城市孤儿”。宽窄巷子的建筑物和四合院已沦为年久失修、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拆拆建建、修修补补的自发行为严重破坏了宽窄巷子的原有格局。而随着现代化高楼大厦在宽窄巷子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宽窄巷子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多余”或“剩余”的空间，或者说成为了成都这个大城市里的一块“碎片”，与周边现代性的城市空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烫手山芋”，宽窄巷子去与留的选择已成为青羊区乃至成都市的一个迫切问题。

事实上，宽窄巷子去留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争议，赞成拆迁者认为原真建筑破烂不堪应当拆除，反对拆迁者则认为

拆迁会破坏历史建筑的原真性。^[3]现在看来，成都市政府和青羊区政府的决策和措施无疑是具有城市发展战略眼光的，从一个城市的文脉延续和文化遗产来说，历史形成的独特城市文化空间不仅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且还应是一个城市必须保护和利用的财富。对于成都来说，这个破旧的宽窄巷子是这个城市不可多得的城市文化记忆和空间文化遗产，可以在城市空间重塑中再生为成都城市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张“金名片”。

从城市文脉的保护传承和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塑来看，可以说，成都市和青羊区改造、利用和开发宽窄巷子就是为了在现代化的成都城市空间中重塑具有自身个性和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其目标是以“宽窄巷子最成都”把历史形成和建构的这个“剩余”或“多余”空间打造成为“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为此，当地政府开始启动和实施以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再生产成都特色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和工程。2003年确立了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主题改造工程，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的基础上，重塑以文化旅游休闲为主，具有浓厚巴蜀文化底蕴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复合型、多元化城市文化空间；2004年，青羊区政府与成都文旅集团共同对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整体打造；2007年，成都市委市政府、青羊区政府以“修旧如旧、保护为主”，“原址原貌、落架重修”为原则，进一步整合和利用资源，对宽窄巷子进行整体性改造和功能性开发，完成了核心保护区周边楼房和建筑风貌的系统整治。所谓的“修旧如旧”、“原址原貌”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保护和重建的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任何重塑、再生、复兴策略实际上都是对原有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再生产，一方面确实基于已有的历史传统，即所谓的“原址原貌”，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当前和未来的城市发展和需要进行的一种“再生产”，因此这种文化空间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相互作用的结果。应当说，今天的宽窄巷子就是对历史的宽窄巷子的一种重建或重塑，一种原有空间的再生产。它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原有宽窄巷子的街巷格局和院落肌理，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北方胡同文化和南方川西民居结合的建筑形质，在现代性的成都城市空间中再生产了“千年少城的城市格局”和“百年建筑遗存的文化空间”，因此它既是“老成都底片”，又是“新都市客厅”。

这张“老成都底片”和这座“新都市客厅”不仅仅是宽窄巷子空间的再生产，也是城市文化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现代化大都市中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再生产。宽窄巷子的重新规划和城市空间的再塑造策略所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德波拉·史蒂文（Deborah Stevenson）所说，“从根本上说，文化规划关注的是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即便它的原则和过程也一直被城镇甚至区域所选择。日常生活文化无疑是城镇的那些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的实践和产品主要是在该城市的物理和想象空间中生产出来的。文化的经济是一种都市经济，公民身份的场所同样是一种都市的场所。……同时，文化规划的策略以及它要培育一种归属感和身份感的抱负，往往来自于都市空间的创造性场所的可能性为前提。场所，象征性的和富有意义的领域关系到归属、共同感和身份。”^[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宽窄巷子的重塑就是一种重新规划，它所关注的正是城市和他的文化，关注的正是城市人的生活。宽窄巷子的重塑远不止是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成都城市文化空间的再生产，通过这种再生产为成都人寻求一种“归属、共同感和身份”。

在一个日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城市中，特色城市文化空间的复兴和打造是治疗城市历史文化失忆症的一个的重要手段和举措。应当说，古老宽窄巷子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房无不见证这个空间的历史与文化，无不浓缩这个独特城市空间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情趣。“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转到来世；于是乎，城市以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串了起来。就这样连续积累，一层叠一层，以往的时间记录不断积存在城市之中。”^[6]45座院落的修复、40%老建筑的保护、传统城市空间的改造，最大限度地“还原”和“重构”了历史建筑和传统空间的原有面貌，这不仅再生产了一个实体意义上的物质性的成都“传统城市空间”，而且再生产了一个渗透着千年历史底蕴的成都“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比如，宽窄巷子中那条东西走向的长达400米的砖文化墙，仿佛“召唤”着人们进入历史文化记忆的空间，唤起人们对往昔历史生活的想象。3万多块旧墙砖从四川各地收集而来，且具有不同的历史断面，实际上便以砖为媒介把老成都历史的深远感、文化的厚重感和时空的沧桑感在城市空间中重新演绎和再生产。

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宽窄巷子“新文化空间”的再生产不仅激活了历史的文化记忆，而且为成都人开启了融历史体验、文化感受和生活休闲为一体的都市空间，赋予宽窄巷子一种新的秩序感、结构感、诗意感和象征性。正如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所写道的：“我们对环境的需要并不仅仅是其结构良好，而且它还应该

充满诗意和象征性。它应该涉及个体及其复杂社会，涉及他们的理想和传统，涉及自然环境以及城市中复杂的功能与运动，清晰的结构和生动的个性将是发展强烈象征符号的第一步。通过一个突出的组织严密的场所，城市为聚集和组织这些意义提供了场地。这种场所感本身将增强在那里发生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并激发人们记忆痕迹的沉淀。”^[6]我们可以看到，再生产的宽窄巷子城市空间中那些原住民、龙堂客栈、精美门头、梧桐树和老茶馆等等历史元素和成都语汇；可以看到街头艺术家、街头艺人、街头美食等等共同激活的城市空间；那些喝茶摆龙门阵、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的男男女女们的身影流动在这个文化空间中；一系列品牌活动激发了宽窄巷子的文化活力，散发着特有的成都气息，延续和传承最成都、最市井的民间文化，唤起了现代成都人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呈现出成都人独有的自在和闲逸。在重塑的宽窄巷子这一城市空间中，文化成为一种活的存在，老成都独一无二的文化氛围构成了宽窄巷子的核心吸引力。

可以说，宽窄巷子城市空间的文化性生产就是利用文化的象征、隐喻功能，对城市空间进行文化再编码、为空间赋予文化意义的符号化过程。由此，宽窄巷子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打造了“老成都人的情感依附地”与“新成都人的形象展览厅”，成为了“成都生活”的一种象征符号，传递着“闲在宽巷子、品在窄巷子、泡在井巷子”的“慢生活”文化情调，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浓郁的本土文化内涵营造出一种“最成都”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以及城市生活方式。

三、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的共生策略——宽窄巷子的范例意义

关于宽窄巷子，在其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议，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从总体看来，宽窄巷子的重塑无疑是成功的。事实上，它不仅再生产了传统的、历史的城市空间，而且再生产了一个独特的、现代的文化空间。宽窄巷子先后荣获“中国创意产业项目建设成就奖”“四川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特色商业步行街”“国家传统建筑文化保护示范工程奖”等等荣誉和称号，就是其成功的一个明证。如今，它确实成为了成都现代化城市空间中的“金名片”。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之中，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物质性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城市的“去地方性”“非传统化”和城市文化的趋同性尤其突出。由此，如何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特殊文化空间和独特文化符号建构具有自身个性和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在今天的特色文化城市和特色文化空间建设中具有战略性的实践意义。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宽窄巷子的空间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个成功案例表明，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改造利用传统的城市空间和重塑特色文化场所需要一种战略性的综合眼光，在城市的历史传统、城市的现代建设和城市未来发展的纵向关系中分析和研究城市的历史文脉和文化肌理，在现有的整体城市空间与传统的历史文化空间的横向关系中分析和研究传统城市空间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明确传统城市文化空间在整个现代城市格局中所具有作用和地位。正如思罗斯比所说，“可持续城市是一种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对文化价值的认可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形式。”他认为可持续城市的发展和建构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问题，有效利用城市空间和通过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化城市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和举措。文化性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能够“加强人们对身份、归属感、创造性和参与意识等文化价值观的认可。”^[7]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都宽窄巷子的改造和重塑就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并通过文化性的城市规划再生产的特色城市文化空间。“成都最中国，宽窄巷子最成都”实际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成都的城市视野，而且是一种中国的城市眼光。被称为“城市会客厅”的宽窄巷子，通过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的共生策略不仅延续和传承了成都的历史文脉，也在现代化乃至国际化的成都城市中再生产了一个具有独特地域特征和历史感的城市文化空间。

其次，宽窄巷子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成功表明，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重新利用已有的传统城市文化空间不仅要具有战略性的眼光，而且必须对传统城市空间及其历史形成和积淀的文化遗产、各种文化元素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如果不是认真研究和尊重已有的历史文脉、结构特征、文化形态和文化功能，再生产和重新塑造的宽窄巷子就会失去其“原真”的文化韵味。“保留历史遗迹和收藏的真实性是重要的。它是体现文化意义的一个重要元素，其真实性可以通过有形的物质、记忆和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无形传统来表现。”^[8]因此，现在的宽窄巷子不仅是对原有城市空间的重新塑造，而且也是对该城市空间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承。

具有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艺术与文化兼具的花园洋楼以及老茶馆、小吃店、老邻居、老街坊等等不仅再生产了一种物质性的空间，而且再生产了一种文化空间乃至独具韵味的生活方式。确实，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一个人们生活和工作地点，城市还是一个象征着很多东西、代表着很多东西的地方。城市是一件想象的、隐喻的、符号的作用。”^[9]从根本上说，城市空间中这种想象的、隐喻的和符号的存在是城市具有生命和魅力的灵魂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宽窄巷子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再塑造，对于今日中国特色城镇和特色街区的建设和打造来说，如何尊重城市的历史文脉和文化特色、如何突出城市的文化个性和彰显城市的文化性格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最后，宽窄巷子作为城市文化空间再生产的成功案例表明，在当代城市空间中利用和再生产传统文化空间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视野，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空间、体验与消费的融合，并以文化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文化化为基础实现多种功能、不同业态的和谐共生。毕竟，传统城市空间的复兴和再利用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原有的空间中，而是在本真性的传承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塑造和激活原有城市空间，从而服务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发挥多方面的城市空间功能，满足当代城市人的文化生活需求。詹姆·多利认为，“在当代社会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政策的主要挑战体现在正确的方法之中，它必须考虑到城市社会的所有维度——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和旅游的——并恰当地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功能单元。”^[10]应当说，宽窄巷子城市文化空间的再生产便具有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视野，它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方法”。它牢牢把握文化这个最核心的要素，将文化作为最有决定性的动力资本，在文化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中激活空间的文化活力，尽可能地发挥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多元共生作用，实际上如今的宽窄巷子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文化记忆、审美感知与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与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多样性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Malcolm Miles .Cities and Cultures 第二部分[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2]Serge Salat.关于可持续城市的研究：城市与形态[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37.
- [3]杨春蓉.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中建筑的原真与模仿之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6）.
- [4]Deborah Stevenson .Cities of Culture : A global Perspectiv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44.
- [5]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
- [6]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华夏出版社，2016. 91.
- [7]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7.
- [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重要文化古迹遗址旅游管理原则和指南）（1999）[A].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C].文物出版社，2007_180.
- [9]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60.
- [10]Jim Doyle : The Possibilities of Cultural Policies[M].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2011.92.